

我只敢在正午的灼日想起你

田洪敏

有些地方，我们的到来就是为了迅速地离开。

于我，大概来到克拉科夫或多或少也会有着这样的情绪。一直到离开我也没有记住当地货币的名称，和酒店对面的一家便利店的姑娘学了好几次的波兰语“谢谢”也没有记住发音。如果不是碍于诚信，答应一定要去雅盖隆大学参会，我大概是不会专程去克拉科夫的，似乎也是放弃了背包客一般的热情了。毕竟往返几日，舟车劳顿，时空作祟，去之前的准备和回来之后的调整，都是有着两边不靠谱的延长线的感觉。在浦东机场办理行李托运，那个姑娘问了几次：慕尼黑转克拉克？我耐心地纠正：中文是克拉科夫。心里也想着除了箱子本身蛮喜欢的，里面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细软——好像也做了行李会丢失的准备。

转机要晃荡近五个小时，从慕尼黑到克拉科夫的飞机上，我四围扫了一下也只有自己一个亚裔面孔，有些落单儿，没有依蔽。一个小时多一点儿的样子就到了克拉科夫，一个类似国内中等外埠城市长途汽车站样子的机场，行李等了好久，居然没有丢，瞎操心。

五月的欧洲还是有些寡淡的冷，天色灰，总是有水汽的样子；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我也认为这个城市与自己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差别：未进入主城之前的街衢偶然会看见类似于苏联 1950 年代的楼房，摒弃掉自以为的阐释与面临的语境，辩弃掉自以为的阐释与面临的精神特权是需要警醒的；霍布斯鲍姆认为 20 世纪是短暂的 100 年，在损失惨重的一战的尾巴上开始，以“东欧剧变”结束；可是相对这片土地，按照这个逻辑再向前推进 100 年，似乎也是“短暂的”。我选择放弃阐释的愿望，毕竟那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领地。所以也或者是因为时差，也或者是因为清冷的空气，我基本是头脑麻木地扔下行李就赶到了会场，没有什么吁嘆嗟兮之声。

仪式感是学术会议安排在雅盖隆大学主楼内一个中世纪的礼堂里，雅盖隆大学被誉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确切的建校时间是 1364 年，荣誉校友只要提一下哥白尼就足够了。后来的小组讨论给我的空间幻觉好像又转至在地下室里，街上阳光明媚起来，可是一进入会议室还是冷，极为清寂，这或许也符合欧洲现代大学想象：热烈自由的激辩和寂寞孤独的研究如影随形。

语文系常年亮灯，七拐八拐的楼梯边儿的小桌子上方也会亮起一盏灯，坐在那里看书我时常犯困，立起来走进不同的办公室里，古老地板咯吱咯吱的声音很有乐感，很安心，也似有冷水激灵醒来的功效，就好像在安静的咖啡馆里突然听到咖啡豆在机器里轰隆隆翻转

的声音，有一种闹腾的乐儿。其实，语文系缩水得厉害，那些凭借文学研究走向思想史或者文化学的人都是文学的革命者，他们怀着不相宜的好意偶尔洄游，带着体面的矜持与自信，那个感觉是不是有些类似当年哈佛商学院隔洋看英伦古典大学的样子，就是这么复杂难缠的学术困境和世俗思绪。语文系的教授普遍厌倦诸如“自我认同”与“解构”这样的概念，或许还是眷恋文学自己的本体吧，——无论如何语文系今天是很多东欧国家学术坚守和变革的起点，相对或者背对而行也都是在寻找自己的坦途。

有限的在克拉科夫的几天里一直有同行者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系的教授 Mada 陪同。据她自己的描述是发现参会名册中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她寻觅亲人一般不费力气就在会议第一天的晚宴中发现了我这个唯一的中国人。Mada 属于那种极端热情的拉丁风格的女子，她用词蛮夸张，说起自己国家地形的起伏和水系的伴随，她说好像是镶嵌着蕾丝边儿，她偷问我波兰国旗为什么是两种颜色而不是三种颜色，我憋着笑，觉得她这个来自邻国的人都不知晓，我也觉得捣乱般欢乐。Mada 自己坦言最初因为喜欢中国菜中国功夫喜欢上中文，据她自己讲一次读到“大片大片的雪花开始簌簌飘落”，她彻底惊叹于“簌簌”的美，几乎是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中文，虽然一起就餐的时候，她说得最流畅的还是“吃——吃——吃”，她的不知道哪个中文老师告诉她这是中国人欢宴时候的客套话，所以她一直和我说“吃——吃——吃”，我就差疯了。她也喜欢庄子，我看着她自在的样子也想起来一个颇为“庄子”的词——在宥。Mada 还人来疯在空旷地给我练上了一段太极，很是入境，她列举的中国太极高人我也不知晓名字；我看她女儿练习武功的视频，脚下虎虎生风，以为是哪个派别的掌门云游时收的徒弟呢。



筆會

瓷 柿

(布面油画)

张 青

选自 2018 上海艺博会

记录

不吃辣的重庆人

沈秋伦

小吴 22 岁，戴副眼镜，穿身西装，显得成熟。但一转身，露出背包拉链上挂着的小熊吊坠。他一动，熊就一跳，透露出书包主人的身份——到底还是个学生娃。午间，我们一起吃饭。餐桌上摆着麻婆豆腐、辣椒炒鸭肉和重庆小面，小吴看了一眼，吐舌摇头：“我不吃辣的。”众人都笑起来，说：“你枉为重庆人。”

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吴，怎么会没有重庆人的味蕾爱好？大约真要追根溯源起来，是因为小吴是重医子弟的缘故。他的父亲是重庆人，从重庆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做医生。父亲的口味是上学前在家里养成的，小吴的口味却是从小在校园内定型的一个校园的地址，在重庆的袁家岗，但这校园的源头，却是在上海。重医里的老教授们、小吴父亲的老师和同事们，乃至食堂的饭菜，多多少少，带着东海之滨另一座城的烙印。

1955 年 4 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奉命建立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以钱惠教授、左景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上医老前辈，响应国家号召，溯江而上。400 多名教职医护人员托足赴渝，于荒地上建起校园。1956 年 9 月 1 日，在还响彻建筑工人号子声和机器轰鸣声的环境里，重庆医学院正式开学上课。

来自上海的吴祖尧教授的孩子记得，初来重庆，酷暑时节，手术室没有空调，就用冰块加电扇降温，一场手术下来，父亲几乎昏厥。由于物资匮乏，

医生们回家后还要在屋前屋后种南瓜、红薯补充口粮。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母亲甚至偷偷输血为孩子们换取黄豆和猪肉补身体。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吴祖尧教授为重庆菜园坝煤场一位工人成功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

左景鉴教授带领第一批医务人员来重庆时还同时负责医院的前期基建工作。他和妻子将上海市中心的公寓上交组织，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山城落户。正在上医读大学的大女儿左焕琛就此在上海没了住处，此后只能以学校宿舍为家。但就是带着这样破釜沉舟的意志，左景鉴教授出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的首任院长，针对肝癌晚期病人实施了重庆第一例肝切除手术。

一开始，在重医，校园里的一切都是带着上海味的。职工之间乡音未改，依旧说上海话，医生们托人带回上海的物品、甚至将上海的煤球炉带来使用。学校最初的仪器设备包括图书、标本、教材、切片，甚至解剖课上最初用的 200 具尸体，也悉数是从上海运来的。时光逝去，第一批赴渝医生们年华老去，但吴依软语的基因却深入血液，留

在了这片土地上。

许多年后，当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吴的父亲，到这里上学时，不免对上海有了别样的情愫。转眼间，他的孩子到了高考的年纪，就遵循父亲的意愿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像是一个圈回到原地，也像一个医学生对授业恩师的一次致敬。这次复旦的师生到重医纪念这段历史，小吴被挑选出来作为复旦的学生代表参加。从上海飞回重庆，于别人是旅行，于是是回家。

吃午饭前，我们站在重医校园内的一棵被特意圈出的黄葛树下。校方告诉我，这是重医初建时钱惠教授带领创业者们种植的黄葛树也是重庆的市树。钱惠教授在 2006 年过世后，选择将一部分骨灰留在这树下。

高大的落叶乔木，将蒙蒙细雨隔绝在外。我问边上的小吴：未来毕业后会留在上海发展吗？

小吴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那么遥远的事，到时候再说吧。而且将来可选项应该会很多呢，也许在上海，也许回重庆，也许出国呢？

我心里想，这的确是属于九零后的

象这个国家在用拉丁文完成乡间诗歌的时代，类似于维吉尔的牧歌还在影响这个国家的时代。进去教堂，其实不太容易寻找到哪一根廊柱属于肖邦的，问在了里面做礼拜的一个中年女子，聊了几句，她好像还能说些俄文，顺利找到了那根廊柱。

我问出生于 1937 年的苏哈涅克教授，那么，还记得一点二战的情形吧。“光明来得太迟了”——他简单描述了几句用这句结尾。81 岁的老先生还是穿戴整齐，随身带着干净的手绢，还有清新口气的小糖豆儿，思维极端敏捷开阔的老头儿。大概是刻意摒弃学问自我指涉的浪漫主义影响，在 60 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几乎工作一生的语文系，组建了斯拉夫世界的现代移民学研究。

其实，克拉科夫或许算是我们眼中的小城，但是并非偏安一隅，它位于被称作“小波兰”的地方，历史上曾经是波兰首都，学者们无法论证它何以会在二战中没有被毁掉，中世纪的建筑得以完整保留。彼时华沙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筑被毁，今天行至于华沙老城，见到的所有巴洛克建筑据一位学者讲都应使用过去时态来表述，算是在每一个词汇里都嵌入记忆。

雅盖隆大学的所有师生无一在二战中幸存下来，主楼门口的纪念雕塑在正午的灼日下格外刺目，它们的风格给我的感觉都是二战之后“成吨的瓦砾”的衍生品，因为不懂波兰文，不知晓那些字母里都写着什么。据说一个纯粹的学者应该是怀疑主义者，必须具有证伪的能力。不过，有些时候在无力面对历史事实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大概只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才能承受这样的痛苦。

离开克拉科夫的时候，我发现车站附近行乞的哥们儿旁边多了一个同道者，几日前他面前摆着一个行乞牌子，上书：For Beer。周围路过的男子都被这种单纯所感染，毕竟在正午的灼日里，奉上一枚硬币助力哥们儿去买杯啤酒还是很仗义的。

我的一盆风兰，是舟山的方圆师兄送给我的。

方圆是我在 1988 到 1990 年间跟杨邦泰老师学拳时的师兄弟。杨老师当时在上海人民广场设场教拳，方圆在舟山沈家门，每月专门坐船过来学拳一次。我比方圆早拜师，他比我长十岁，所以互称为“师兄”。但实际上，他学得比我好得多。他学了拳真能打人，我学拳则不过是活动身体而已。

方圆师兄在中学时受人欺负，他父亲就送他去跟一位练长拳的师傅学拳。学拳不久，就把师傅的儿子给打了，只能离开。等遇到杨老师时，已转益多师，功夫本身已不错了。再加上身体素质好，肯吃苦，悟性强，能动手，杨老师也很喜欢他，将毕生所学倾囊而授。

后来杨师去世，我跟他就失去了联系。当时还没有手机，连固定电话也很少。我爸妈家有个固定电话，我结婚后在浦东的家连个电话都没有，打电话要靠传呼。后来又搬了一次家，就更难找到了我。

没想到，到 2017 年，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又联系上了！靠的还是我爸妈家的那个固定电话号码。他们虽然也搬了家，但号码没变。

在碰面时，方圆师兄已经退休，不但是舟山武术界的翘楚，也是舟山山界的第一人，最多时曾养了一千多盆兰花，五百多个品种。后来兰棚遭受兰花病毒的侵染，死了许多兰花，现在仍有二百多种。

去年（2017）冬我去舟山看方圆，也去他的兰棚看了。一个兰棚里养着珍贵的春、惠兰品种，里面喷水、通风、加温、照明的设备应有尽有。

还有一个棚子里养着比较普通的蕙兰，还有一个个长方形的盘子里放着水苔，养着舟山本地产的风兰。方圆师兄当时就从水苔盘子里扳了一株有四个头的风兰给我。

风兰是一种附生植物，也就是说，它生长在别的植物上，但并不窃取它们的养料。方圆说，在它的原生地，风兰一般是长在大的落叶树上。它的根，会黏附在树皮上，把植株牢牢固定，即便有大风也不会把它刮落。夏天，日光强烈，树叶茂盛，风兰得到遮荫；冬天，日照减弱，而树叶也掉落了，风兰又得到充足的光照。在树干上，风兰从被雨水冲刷下来的腐叶、鸟粪等东西中吸收养分。

回到家里，一方面是手头正好没有水苔，一方面也是想到了风兰在自然界中的生境，我就用腐叶和树皮来种它。这些植料原来是我储存在来种洋兰的。然后又撒上几粒颗粒状的海鸟磷肥（鸟粪），和氮磷钾三合一的颗粒状缓释化肥。我施肥一般都是化肥和有机肥结合，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用合适的植料和基肥把一种花给安顿好，可以说是种好花的最重要的一步，就像是给一幅建筑打好一个好的基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以后只要浇好水，在最初的那半年里不追肥都没有关系。

种好后，我就把这盆风兰放在室内朝南的窗台上。正是严冬，这样它就不会被上海偶尔会有零下低温冻坏了。

天气转暖后，我就把风兰拿到顶楼阳台上，那里它可以得到明亮的光线照射。等进入初夏，我就把它移到比它高大的木本花的新叶下。它们会替它遮挡掉过强的阳光。

在冬天和初春的这几个月里，这盆风兰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看样子它是种生长缓慢的植物。我注意到它在春雨的滋润下，只是长出了几条白白的新根，有的就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这些根上面覆盖着一层起保护作用的白白的根套，只有顶端圆钝的根尖暴露在外，是鲜绿色的。

我是把风兰种在普通红陶盆里。方圆师兄是用大浅盆子种。甚至还有人把风兰挂挂在盆景上，根部敷些水苔，也能挂。风兰是顽强的，能适应多种环境。

方圆师兄回舟山后不久，

风兰就开花了。纯白的小花，五片花瓣加上一片钝三叉戟形的唇瓣，还有一根合蕊柱（从严格的植物学的角度来说，三片是萼片，另外三片才是花瓣，其中一片进化成唇瓣，其实是给授粉的昆虫落脚的地方。至于合蕊柱，则是兰花特有的生殖构造，是雌性的蕊柱和雄性的花药的合二为一）。唇瓣也是一片纯白，上面一个杂色的斑点都没有。

这种风兰的个头小，只有六七公分高，香气却比春兰要浓，鼻子凑近花朵就可以闻到（春兰的香味是若有若无，凑近了往往闻不到），可以说不愧名字里的这个“兰”字。

风兰的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唇瓣与合蕊柱之间的孔窍，通往一根长长的像动物身上的盲肠一样的管子，植物学上叫做“距”，是一个贮存花蜜的器官。这个距有四到五公分长，比花梗还长。看来要有一个长着长喙的蛾子或蝴蝶，才能吃到那里面藏的蜜呢。这个长距，也让风兰的花看起来有些奇怪，有点像绿豆芽。

风兰早晨不太香，傍晚是它集中放香的时刻。有天傍晚，我打开楼下小阳台的玻璃门，这盆风兰放出的浓烈香味就钻入了我的鼻孔。这么小的花，居然这么香！嗯，这是友谊的香味啊！

冯京第又说风兰“挂在水上即

闲情偶植

友谊的香气

谈瀛洲